

民国经济思想研究丛书

民国时期 保险思想 研究

A Study on the Insurance Thoughts
in the Tim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朱华雄 ▶ 著

丛书主编 严清华
邹进文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民国经济思想研究丛书

民国时期 保险思想 研究

A Study on the Insurance Thoughts
in the Tim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朱华雄 ▶ 著

丛书主编 严清华
邹进文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时期保险思想研究/朱华雄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3. 12

民国经济思想研究丛书/严清华 邹进文主编
ISBN 978-7-307-12357-1

I. 民… II. 朱… III. 保险业—经济史—研究—中国—民国
IV. F84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12918 号

责任编辑:黄 殊 责任校对:鄢春梅 版式设计:詹锦玲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cbs22@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9.75 字数:224千字 插页:1

版次:2013年12月第1版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12357-1 定价:26.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买我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总 序

由于研究难度及进入成本的高昂，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自它孕育产生约一个世纪以来，始终没有成为经济学的显学。虽经几代学人筚路蓝缕，艰辛开拓，使这门学科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其至今仍存在严重的不平衡发展。其中，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就显得非常薄弱，基本上处于研究的空白地带。我们认为，新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发展与创新，既要有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的新突破，也要有研究领域的平衡发展，大力开展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是新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界同仁所肩负的一项义不容辞的历史重任。

民国经济思想史为什么长期没有得到系统的深入研究？我们认为其主要原因是：第一，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分期没有给“民国经济思想史”以明确、独立的定位。因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界长期以研究古代为重点，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大多只到1919年，对1919—1949年经济思想史的内容不太涉及，1949年以后的内容又属于新中国经济思想史，所以使得民国经济思想史被人为地割裂开来，没有获得独立的位置。第二，因为长期以来“极左”思想对学术的干扰，学者们将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视为学术禁区，不敢轻易涉足。第三，

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本身的难度也是造成其研究不足的重要原因。因为当时西方的各种经济思潮纷纷涌入中国，出版业相当繁荣，大量经济学论著问世，令人眼花缭乱，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进行搜集、甄别、整理和提炼，这对一般研究者来说颇有难度。

当然，在近一个世纪中，学术界也有部分论著涉及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但总体看来，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始终没有获得独立的位置，已有的研究成果还是片断的、零散的，亟待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界对之进行系统、深入的探讨。

在源远流长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中，民国经济思想史只是极其短暂的篇章；而且民国时期中国经济思想的内容主要是转述国外流行的经济理论，少有中国人自己的创见。那么，民国经济思想史是否不值得研究和整理？民国经济思想史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中的地位是否无足轻重呢？问题并非如此简单。

首先，民国经济思想史开辟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新时代。中国经济思想在 17 世纪以前取得了辉煌成就，自 17 世纪开始西方各国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逐渐构建了市场经济理论。市场经济理论是人类经济思想史上的巨大进步，是人类经济思想划时代的革命。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近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体制，也没有出现近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思想。大体肇始于清末，初步完善于民国时期的中国近代市场经济理论，虽然不是内生的，而是由外部注入，主要是靠引进西方流行的经济理论而形成的，但这些经济思想却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划时代的革命，标志着中国经济思想的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其次，民国时期中国经济思想家们在引入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过程中，不少人非常注意与中国的经济实践相结合，并非仅仅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如马寅初先生在《财政学与中国

财政——理论与现实》一书中对于当时流行的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即做了辨析，从9个方面阐述了凯恩斯学说不适用于中国的道理。李权时等学者也明确主张要写“国货教科书”。这些经济学者对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理论做了初步探索，对于中国当代经济理论的发展也具有借鉴意义。

民国时期还有一批远涉重洋留学欧美的留学生艰难求索，取得了跻身世界经济学学术之林的经济学研究成果。如张培刚1947年在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获得了哈佛该年度的威尔士最佳论文奖并被列入哈佛经济丛书出版。该书于1951年被译成西班牙文在墨西哥出版，曾被美国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大学列为教材，被国际上视为发展经济学的首创著作。蒋硕杰1945年在伦敦经济学院获得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景气循环和边际利润的波动》，他在20世纪40年代在英国著名的《经济学》等杂志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特别是他的有关经济增长方面的论述被西方经济学名家所征引。费孝通1938年在英国伦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中国农民生活》，1939年在英国出版，迄20世纪80年代该书英文版已重印三次，被许多大学列为必读参考书，被英国学者称为里程碑式的著作。该书在1981年获英国皇家人类学会人类学最高奖——赫胥黎奖章。杨汝梅1926年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论文题目是《无形资产论》，该论文对当时西方学术界尚无定论的许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立见解，受到西方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民国经济思想虽然与同时期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思想相比，从整体上显得落后，但当时的学者们并非亦步亦趋地学习西方经济理论，而是试图有所创新。而且有些创新至今看来也并不过时，甚至我们今天对有些问题的研究也未必超出了20世纪

30年代学者们的水平。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当代许多研究市场经济理论的学者对于中国经济思想的源流并不十分清楚，他们的论著不断“重新发现”着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界早已充分讨论的问题。

再次，民国经济思想史与民国市场经济史关系紧密，不深入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就不能很好地研究民国市场经济史。民国时期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变迁是一种典型的移植性变迁。它是在学习、借鉴西方成熟经验的基础上，将西方先进制度移植、引进到中国来的。在移植过程中，由于中西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移植主体对移植客体常常发生“排异”反映，西方先进制度往往不能有效发挥其效能。民国时期为了推进中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创新，理论界在充分借鉴西方近代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围绕中国当时的实际经济问题，展开了热烈的探讨和比较系统的研究。从一定意义上说，民国经济思想史是解剖民国经济史的重要工具。民国经济思想史学界探讨民国经济问题的成败得失对当今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与市场经济理论创新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是一项浩繁的学术工程。以一己之力，兼通中外古今，又对经济学各分支学科的概念、学说、渊源、流派等作出系统深入研究，的确难乎其难。本丛书汇集了近几年在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思想史专业攻读博士学位的青年才俊和长期从事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教学和研究的学者。他们对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功力各有高下，领悟各有长短，但作为学术开端，又各有其特色与意义。本丛书与其说是为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填补学术空白，毋宁说是探索途径，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界展现一片广阔的学术领域，以期引

起学界同仁的重视，共同促进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不断向新的学术广度和高度拓展与推进。

严清华 邹进文

自序

民国时期（1912—1949）的经济是在战祸频年、天灾未已、人祸不断、存亡未卜的背景下，开始其发展历程的。长期以来，由于意识形态的障碍，理论界对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缺乏一个客观的总体评价，主流的认识是民国时期是经济凋敝、金融枯竭、民不聊生的时代。从20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国外的一些学者通过计算论证民国时期工矿业的发展状况，得出了与我国主流观点不一致的结论：中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其工矿业得到了相当迅速的发展，而不是处于破产或半破产的状态。在国内，著名经济史学家吴承明较早提出了1921—1936年“是中国资本主义范围扩大的时期，或资本主义化的时期”的新观点，并指出过去论者的观点“恐怕多数过于悲观了”。^①刘佛丁（1999）定量分析了1914—1936年间中国的国民收入状况，结论表明：22年间，中国的国民收入和人均国民收入分别由188.64亿元和41.22元（注：单位为1936年的币值）增加到257.98亿元和50.51元。国民收入增加了

^① 吴承明. 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129-130.

37%，年递增 1.45%；人均收入增加了 23%，年均增长 0.92%，无论增长幅度和增长率都大大超过前一时期^①，成为旧中国经济增长最快，也可以说是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两项指标均在 1936 年达到旧中国历史发展的最高水平。^② 上述研究表明，过去经济史著述中认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经济就日趋衰落甚至破产的观点是不成立的。

英国著名学者柯林武德认为：“历史的过程不是单纯事件的过程而是行动的过程，它有一个由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③ 史学工作者的任务不仅是单纯发现历史事件，还要研究其中的思想。同时，唯物史观启迪我们：一种思想或学说，来自于已有的思想材料，而思想材料则深藏于经济的事实。这就是说，经济实践是经济学说的基础，经济实践的发展必然推动经济理论的进步。既然民国时期的经济实践不是停滞而是发展的历史，那么它的经济理论研究也应该是一个不断发展和超越的过程，这是唯物史论者对民国经济思想成果应有的基本判断。而事实也证明：民国时期的经济思想是非常丰富的。由于民国时期是一个社会急剧变革的转型时期，也是各种矛盾和冲突不断的时期，内有新旧政治体制（君主制与资产阶级共和制）、新旧军事派别（大大小小的新旧军阀）以及新旧思想（传统的纲常伦理与资产阶级自由、

^① 前一时期指 1887—1914 年，这一时期的国民收入由 143.43 亿元增加到 187.64 亿元，增幅为 30%，年均增长率为 1.0%；人均国民收入由 38 元增加到 41.22 元，增幅为 8%，年均增长 0.3%。

^② 刘佛丁．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70。

^③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点 [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302-303。

民主、平等思想)的矛盾和冲突,外有东西文化(“西学东渐”)、强敌入侵(日本的侵略)的冲突。这些冲突一方面引起社会的动荡,另一方面也激起学者们救亡图存的豪情,中国学者以庄重的责任感和学术良知,以自己所从事的学术事业来救国救民,从而致使学术主体理性的极度张扬,开创了思想文化领域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新时期。有学者曾断言:民国时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中西古今学术的整合、调适、创新时期。

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国,由于台湾当局和祖国大陆的长期对峙,为避免为敌对阶级树碑立传之嫌,学者们对民国史的研究噤若寒蝉,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开始了民国史研究的春天。不过,据笔者陋见,在学术界目前还没有一部系统研究民国经济思想的著作。武汉大学的严清华教授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理论研究空白,他从2002年开始着手准备这一庞大的研究工作,笔者有幸承担民国金融思想的研究任务。2005年,我在痛苦与不安中完成了博士论文《民国时期金融思想研究》,痛苦源自于自己的浅陋,不安则来自于对恩师的愧疚。在博士一年级时,导师就帮助我选定了论文题目,并无私地支持我两次前往国家图书馆查阅资料。但是最后的成果却让我惴惴不安,因为我感到无论是文章总体的驾驭,还是具体问题的分析,均有许多值得推敲的地方。许多关心我的人多次问我,要评职称了,为何不把博士论文出版,我只好如实相告,论文还有很多问题,不敢出版,怕被同仁耻笑!

既然大事做不了,为何不从小事做起呢?既然民国时期的金融思想无法驾驭,为何不从其分支开始?于是开始再次审视我的研究视角。在邹进文教授的启发下,我发现民国时期的保险思想研究甚少,于是从2006年开始了研究的第一步:搜集

有关保险史和保险思想史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有关民国时期保险问题的研究成果。

从搜集的资料看，当代对于民国时期保险业的研究主要发轫于改革开放之后，但理论界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对民国时期保险史料的整理和编辑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中国保险史》（中国保险史学会，1998）、《中国保险史志》（颜鹏飞，1989）、《中国保险史话》（吴申元、郑韞瑜，1993）等。

从保险思想史的角度考察，其成果却略显苍白。中国保险学会编撰的《中国保险史》（1998）在第一章第五节中对西方近代保险思想在中国的传播问题作了探索性分析；宋士云（2004）对民国时期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分析，并评价了其实施绩效；岳宗福和聂家华（2004）认为国民政府时期社会保障模式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阶段，国民政府当时草拟的第一批社会保险法规是中国社会保险制度化的有益尝试，也是中国法制近代化的重要内容；朱文胜的《中国保险业制度变迁与绩效研究》（2005）在第四章第二节中对中国保险思想的萌芽、形成及发展做出了简要论述；姜春燕（2005）对南京国民政府推行社会保险的原因、社会保险的机构和政策法规以及存在的缺点等做出了初步分析，并作了简要评价；李琼（2006）对川北盐工保险政策思想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论述，并分析了这一实践活动在民国时期社会保障制度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意义；杨锦銮的《近代中国保险思想启蒙论述》（2006）讲述了中国近代西方保险的传入及魏源、洪仁玕、郑观应、陈炽等先进知识分子对近代保险思想传播的贡献；赵珂（2007）分析了民国时期江西临川开展的耕牛保险的实践思想；翟海涛、何英的《西方保险思想之“东渐”与中国民族保险业之创生》（2008）和麻光炳的《西方近代保险思想在中

国的传播及中国民族保险业的兴起》(2000)均讲述了中国近代保险思想的缘起及民族保险业的实践过程。

在仔细研究上述文献的基础上,我开始了研究计划的第二步:梳理近代以来中国保险业实践和保险思想的发展线索。

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自然灾害与意外事故,在任何社会形态下都可能发生。中国古代,为了弥补和减少自然灾害与意外事故造成的各种损失,保持生产活动的连续性,一些思想家相继提出了后备防灾、守望相助等保险主张,并通过政府主导的荒政措施、仓储制度和一些民间防损组织(如镖局和各种合会组织)加以实施。这可以说是中国保险组织和保险思想的渊源。

但是,中国现代意义上的保险制度是西方直接“入侵”的结果。在商品经济和海运贸易刺激下,自18世纪起,西方近代保险业逐渐完善起来,并不断向外扩张。1805年外商在广州建立了第一家保险机构——谏当保险行(Canton Insurance Society),此后,外商独占中国保险市场近60年。1865年5月25日我国第一家自办的保险机构——上海义和公司保险行成立,标志着近代民族保险业的正式诞生。

从清末到民国,中国现代保险业的发展趋势是不断壮大,基于实践基础上的保险思想也不断发展,但每个阶段的实践与思想各有其特点:

1840—1864年,从实践看,外资保险公司一直垄断着中国的保险市场,但保险业务总量较少,业务对象为在中国的洋人。从思想上看,魏源在《海国图志》(1842)中介绍了西方的水险、火险和寿险,是在中国传播现代保险理论的第一人;随后,洪仁轩的《资政新篇》(1859)、郑观应的《盛世危言》(1861)、《救时揭要》(1862)等相继介绍了西方保险业的功

用与价值。

1865—1911年，从实践看，民族保险公司开始产生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得到较快发展；外资保险公司的实力得到进一步扩张。从思想内容看，学者们重点探讨了保险与国家经济贸易，尤其是与航运业、轮船业的密切关系；提出政府应正视保险的商业地位；鼓励民族资本投资保险业，与洋商争利，具有鲜明的爱国特色。

1912—1926年，从实践看，民族保险业大量吸收官僚股份，此时展开的保险实践主要以水上运输保险和火灾保险等为特色，同时民族保险同业公会组织有了很大发展。从思想内容看，在西方保险思想的影响下，关于保障民生的如失业、医疗等保险思想开始在中国传播，从而为民国时期保障性保险的创办奠定了前期的理论基础，此时以人寿保险为代表的惠济民生方面的保险业发展迅速，因此，人寿保险的研究和探讨成为了热点。

1927—1936年，从实践看，中国的银行业相继投资于保险业，保险经纪人和保险公证行不断兴起与发展；本阶段出现了大量新兴保险业务，例如婚嫁保险、汽车保险等。从思想内容看，保险立法思想不断完善，主要体现在移植西方法律、选取保险立法体例及限制外商保险发展等方面；此外，学者们提出了丰富的农业保险合作思想，他们认为中国应该采取合作社制度来发展农业保险事业，并提倡开展以耕牛保险为主的家畜保险试验，其目标在于通过农业保险合作来复兴农村经济。

1937—1949年，从实践看，国家资本开始染指保险业；沿海地区保险业受到重创；保险业中心由上海迁移到重庆。从思想内容看，发展社会保险的思想十分丰富，诸如关于社会保险建立基本原则和如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思想等；此外，这一

阶段正处于战争时期，关于如何开展战时兵险成为学者们讨论的热点问题。

在梳理各个时期保险实践与思想的特点的过程中，也相继指导我的研究生做初步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果：朱华雄、王芸的论文《国民政府时期农业保险合作思想与实践述论》（载《经济思想史评论》2006年第三辑），探讨了国民政府时期为挽救和复兴农村经济而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农业合作运动的保险思想；田继文的硕士论文《民国保险思想研究》（2008）以时序为线索，介绍了民国时期保险思想的内容、发展和影响；朱华雄、孔捷的论文《民国时期（1912—1949）保险思想研究——基于民族保险业的考察》（载《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11期）以险种设置为序，阐述了民国时期人寿保险、社会保险、农业合作保险、战时兵险等险种的基本原理和运营方式，并探讨了保险立法的选择问题；朱华雄、饶丹雪、刘念念的论文《民国时期（1912—1949）人寿保险思想概述》（载《经济学动态》2013年第5期）对人寿保险思想的基本内容作了分析；饶丹雪的硕士论文《民国时期财产保险思想研究》分析了民国时期财产保险思想的主体内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以《民国时期保险思想研究》申报教育部2012年度人文社科基金课题，并获得成功。

在完成了上述工作以后，我开始了研究计划的第三步：系统整理民国时期的人寿保险思想和财产保险思想。

近代以来，由于我国的人寿保险业实践最初由外资完全垄断，因此学者们始终秉承着收“外洋之利”的目的来推动民族保险业的发展，而近代中国人寿保险理论体系在早期完全是基于西方商业理论而构建的，与近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基本状况和国人富民强国的理想目标存在着很大程度的背离。从当时保

险业发展角度来看，由于对西方现代保险理论和制度有一个认识水平逐步深化的过程，并且在不同阶段经济社会状况下，保险需求的群体和种类也不断发生着变化，人寿保险思想逐步经历了从“舶来”到“认知”再到“创新”的这样一个西学东渐的过程，这是近代以来西方先进理论和制度“中国化”的必由之路，民国时期的学者们在借鉴西方先进思想、结合具体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具有时代特点的人寿保险思想，这些思想是十分珍贵的遗产。

民国时期人寿保险思想的发展历程和发展水平与当时保险业的实践是联系紧密的。人寿民族保险业的实践促进了人寿保险思想的发展。反过来，人寿保险思想的发展对民国时期的人寿保险业也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从积极方面考察，民国时期的人寿保险思想对人寿保险业发展的正效用主要表现在：其一，民国时期人寿保险思想在传播保险知识、提高人们的保险意识等方面具有极大地推动作用。现代意义的保险制度在近代中国始终是一件新生事物，西方的保险制度设计和保险理念与近代中国的经济状况相去甚远，因而必然要经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同时，向广大民众传播保险知识是十分必要的，它是近代保险业发展的思想基础。民国时期的学者们对人寿保险的基本原理的介绍，提高了人们的保险意识，从而促进了民族保险业的发展。其二，民国时期的人寿保险思想对民族保险业的实践起了积极的指导作用。学者们通过介绍西方人寿的运营方式、设计保险模式、创设符合当时国情的简易人寿保险等，直接指导了现代保险业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其三，民国时期的人寿保险思想具有鲜明的反西方经济侵略的特点。中国的保险市场是在西方列强不断地侵略下被动开放的，西方列强在中国近代的保险业中一直处于强势地位，外国保险公司从中国获取了

巨大的利润，因此，从中国近代第一家华商保险公司开办时起，学者们始终秉承着收“外洋之利”的目的来推动民族保险业的发展。

但是，民国时期人寿保险业的发展并不顺利，真正有效发展的时间很短，而且各险种的开发更多地是模仿西方的制度设计，从而在当时人寿保险思想的发展中必然会反映出这个时代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其一，民国时期的人寿保险思想基本是对西方保险思想的移植。如，民国时期人们对于人寿保险的认识主要来自于对西方国家的人寿保险发展情况的分析，当时出版的关于保险书籍中主要是依靠翻译的国外著作，缺乏理论创新性；其二，保险思想指导保险实践的作用有限。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战争、人们保险意识等因素的制约，学者们设计的各种制度、方案、法规，大多是纸上谈兵，未能得到有效贯彻。

保险的本质是弥补和分摊意外损失。早在三千多年以前的扬子江商人，创造了货物分船装运的方法，这可以说是财产保险的雏形。此后的川江盐运、东北漕船运输等都体现了危险分散和损失分摊的保险原理。发轫于明永乐年间，兴盛于清末的镖局，更好地体现了财产保险的目的和价值。但中国原生的诸多财产保险形式，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逐步被西方资本主义的财产保险组织所取代，外商保险公司垄断中国保险市场近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面对外国保险公司垄断中国保险市场、攫取巨额利润的严峻情况，借助民族商业、航运业、银行业不断兴起的现实经济条件，中国的民族保险业开始起步。至民国时期，财产保险业得到迅速发展：保险公司的数量和实力不断扩大；保险范围从运输业扩大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银行业不断渗透到保险业等，特别是开设了一些具有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的财产保险险种，如耕牛保险，战时兵险